



历史上的今天

张俊杰 主编

(七十二)

# 目录

10月11日.....	1
国内.....	1
1086年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逝世.....	1
1896年孙中山被清政府驻英公使诱骗绑架.....	7
1911年武昌起义军推举黎元洪为都督.....	8
1950年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	9
1983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10
国际.....	27
1531年慈温利于卡佩尔战役中战死.....	27
1885年法国作家莫里亚克出生.....	27
1889年英国物理学家焦尔逝世.....	29
1919年丹麦作家吉勒鲁普去世.....	29
1987年考察队对英国的尼斯湖进行考察.....	30
10月12日.....	32
国内.....	32
1678年吴三桂死.....	32
1885年台湾新建行省刘铭传为巡抚.....	35
国际.....	47
1896年蒙塔莱出生.....	47
1942年美军在埃斯佩兰斯角战役中打败日军... ..	48
1946前美国陆军部队司令史迪威将军病逝... ..	139
1971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逝世.....	145
10月13日.....	146
国内.....	146
982年辽景宗逝世长子隆绪继位.....	146
1923年广州各界声讨贿选总统曹锟.....	147

1944 年中共代表林伯渠致函国民党代表阐述双方 继续谈判的条件 .....	148
国际.....	151
1924 年法朗士去逝.....	151
1943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53
10 月 14 日 .....	153
国内.....	153
1428 年明宣宗同反叛兀良哈交战于宽河.....	153
1951 年政务院明确提出“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	155
1952 年美国向上甘岭阵地发动最大的攻势....	156
国际.....	156
1912 年西奥尔多·罗斯福遇刺 .....	156
1944 年纳粹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服毒自杀....	156
1953 年日本共产党创建人德田球一逝世.....	157
1969 年世界标准日.....	158
1973 年埃及军队投入十月战争.....	160

10月11日

国内

### 1086年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逝世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哲宗时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坚持旧制，反对王安石新法。主持编纂《资治通鉴》。诗文有《司马文公集》。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年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

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天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

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

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 300 多种。长编长达 6500 多卷，3000 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 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 16 个朝代 1362 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 294 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 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

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

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如

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 1896年孙中山被清政府驻英公使诱骗绑架

康德黎（James Cantline, 1851—1926）：孙中山的老师，英国人，阿尔伯丁大学毕业，曾为伦敦外科名医。1885—1896年任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之前已任医学教

授两年。在该院执教将近十年，为中国培养不少西医人材。孙中山先生即为其得意学生之一，且以其品学兼优而备受器重。康德黎学识渊博，待人诚恳，教学认真而有方。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康德黎不辞劳苦，多次前来协助孙中山为病人施行外科割治手术。回国后任伦敦市议会顾问医师。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时，遭清使馆绑架，康德黎全力营救，终于使孙中山安全脱险，从此两人关系益加密切。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康德黎大喜过望，特著《孙逸仙与新中国》（SunYat-SenandAwakeningChina）一书，称誉孙中山的伟大人格及其领导中国革命的目的，建设新中国的步骤等。1919年孙中山著英文《实业计划》一书，亲自题辞，赠与康德黎。孙中山逝世后，康德黎在伦敦参加追悼会，报告孙中山生平事迹，声泪俱下。两年后即病逝于英国，年七十五岁。

### 1911年武昌起义军推举黎元洪为都督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县夏店（今属大悟县）人，寄籍江夏县（今武昌县），祖籍江西南昌。

1883年（清光绪九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884年毕业后曾任广东水师“广甲”舰二管轮，后一度调湖北枪炮厂当差任监工。其后又随“广甲”编入北洋水师，参加了中日黄海大战，舰毁凫水获救。1895年应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召赴宁，监修新式炮台，先后任狮子山等处炮台总教官，专台官，颇受器重。1896年随张回鄂，任枪炮厂监制兼护军后营帮带官，参与训练新军。1898年至1901年，曾三赴日本考察军事、政治。归国

后 1906 年，擢升暂编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修造江阴、江宁两炮台。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时，他随赴武汉，并在编练新军中多次镇压革命活动，亲手杀害起义士兵。武昌起义时，他藏在幕友刘文吉家中。因革命党领袖均不在武汉，革命党人缺乏经验和自信，强迫他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仍任原职。1914 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篡改约法，改设参议院，被任为院长。1915 年袁称帝时，黎元洪极为反感，被封为武义亲王，未受。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继任总统。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段利用张勋将黎元洪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1922 年，他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复任总统。旋又被直系军阀驱逐。晚年投资实业，后逝世于天津。

## 1950 年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

1951 年 1 月 27 日，达赖喇嘛派人到印度新德里请中国驻印大使转达他致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封信，信中报告了他亲政的情况，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2 月 28 日，达赖喇嘛派出西藏地方政府赴京和谈代表团。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一贯主张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指派李维汉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同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于 4 月 29 日在北京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在六轮正式会谈中，进行了认真充分的协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立场，同时又充分听取和考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所提出的合理建议。谈判于 5 月 21 日结束，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

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该协议由前言和17个条文组成，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巩固祖国统一。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各项改革必须实行，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办法解决之。实现西藏内部的团结统一，主要是达赖和班禅两方面之间的团结。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改善人民生活。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勤政殿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签字仪式。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登且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在协议上签字。《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西藏民族永远脱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友爱合作大家庭来，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权利，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石，亦即是西藏人民从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第一步。

## 1983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从一九八

三年下半年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十二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这一重要决定的问题，确定从今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

### (一)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尽管十年内乱使我们党受到了严重损害，党的队伍的主流仍然是纯洁的和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妥善地处理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重大问题，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机构改革和调整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开展了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以及纠正各种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行为的斗争，进行了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和斗争，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得到了初步整顿，党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健康力量在党内已占强大优势。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完全能够依靠本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阴暗面，纠正自己的错误，更加生气勃勃地前进。

但是，几年来我们党在紧张地进行上述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的过程中，还来不及针对党在思想、作风、组织各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整顿。对党员的教育还进行得不普遍、不充分。十年内乱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有所增加，我们为抵制、克服这种侵蚀而进行的工作和斗争还不够有力。由

于这些原因，目前党内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有些党员对拨乱反正的伟大意义缺乏认识，还没有站到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立场上来，有些党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优越性、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认识模糊，思想混乱。在思想战线上，有些党员对违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熟视无睹，有的甚至公然传播这些思想。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个人主义严重，甚至恶性膨胀，为谋求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走上犯罪道路。有些党员和党员干部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弛，精神不振，无所作为，不起先锋模范作用。有些党组织软弱涣散，甚至处于瘫痪状态，丧失战斗堡垒作用。在党内，“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还没有完全清理。这种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对党的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有效地加以整顿。

我们党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是伟大光荣的，也是十分艰巨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央早已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也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现在，我们党除了存在着上述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以外，还在许多方面同我们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相适应。这次整党总的目的和要求，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依靠全党同志的革命自觉性，正确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执行党的纪律，揭露和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更加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这次整党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夺取新的伟大胜利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保证。

## (二)整党的任务

中央认为，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第一，统一思想，就是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是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基本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是纠正“左”的错误，反对右的错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把四项基本原则同当前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得到了广大党员的衷心拥护。党的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党的政治纪律。能否做到这一点，是衡量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政治和纪律状况的主要标志。

目前，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还没有从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歪曲四项基本原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持抵触态度，有的甚至阳奉阴违、公开抗拒；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

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他们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都是同党的性质、纲领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相容的。

犯有这些错误的党员和党员干部，多数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要通过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和耐心的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纠正错误。对少数坚持错误的政治立场而拒绝改正的，不但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思想斗争，还要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决不能只是在口头上表示一致，而必须在实际行动上保持一致。要坚决地改变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软弱无力的状态，要自觉地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坚决地抵制和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影响。

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就要把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独立负责地进行工作。要克服主观主义，认真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讲实事求是，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保证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执行，也才能不断地用新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发展它们，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

第二，整顿作风，就是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正是由于